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论纲

陈 峰

摘 要: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要走出对传统革命史叙事的路径依赖,超越以史家、史著为中心的基本套路,在思潮流派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有必要引入范式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孕育于五四时期,初创于社会史论战中,基本定型于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实现了对正史范式和实证范式的双重超越,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学术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过程中,域外学术产生了关键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对正史范式和实证范式既有尖锐批判,又存在吸收互动,与实证范式的关联尤为密切。参与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学术共同体是动态开放的,构成较为复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实证范式;范式理论;学术共同体;批判;互动

作者简介: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1)04-0005-10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呈日渐升温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复兴的动因与前些年已有所不同,它主要不再是老一辈学者视为必须坚守的学术阵地,而是年轻一代学者新发现的学术增长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虽仍受到体制力量的扶持和规约,但其学术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它必须走出对传统革命史叙事的路径依赖,融入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潮流,进行彻底的改造、转型和升级。这就要求学者在吸收整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必须积极借鉴和引入新的理论方法,寻找新的分析工具,否则纵有若干量的积累却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本文即试图探讨范式理论如何应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或者说如何在范式视角下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与兴起研究”(19AZS002)。

一、史学史研究为何要引入范式理论?

范式理论是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用来分析自然科学演进的一个工具。与通常的看法不同,库恩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发展视为一个累进的过程,而认为是范式革命的产物。根据一般的认识,范式“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①大体可理解为某一类科学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共有的基础和准则。范式的另一层含义是范例,即共同体在研究活动中处理过的典型实例。范式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遭遇了很多质疑,引入人文领域后却大受欢迎。

国外学者较早尝试运用范式理论考察历史学的发展。1976年,南斯拉夫美籍学者斯托扬诺维奇在《法国的历史方法:年鉴学派的范式》一书中将西方史学的进程归结为三个阶段: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时代的史学为“资训型范式”(exemplary paradigm),兰克史学为“叙事型范式”(narrative paradigm),此后则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型范式”(structuralist-functional paradigm)。^②由此,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就被称为一种范式。年鉴派“新史学”与兰克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的不同被规定为范式的不同,被视为史学的方向性转折。这是借用范式概念把握历史学发展的一种成功尝试。这种认识也为中国学者普遍接受。

中国学者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时采用了范式理论,根据对历史发展主线的不同认识概括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范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传统被称为“革命史范式”,而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重新探究近代史的做法被归结为“现代化范式”。两种范式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历史观层面,即“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的分野。而将传统的研究套路冠以“革命史范式”之名,有利于展开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反思。研究者通过“现代化范式”对“革命史范式”的挑战,试图用前者取代后者,以实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突破。态度较稳健的学者则对是否存在这两种范式表示怀疑。^③

在讨论社会史的定义时,有学者借助范式概念,断定社会史不是一般的专史、不是通史,而是一种范式。赵世瑜对此做过系统论证,他说:“社会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倡导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它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④他将社会史的使命定位为改造整个历史学,而不仅是开辟一个新领域、增加一个新的史学分支。赋予社会史以范式意义,体现了部分社会史倡导者和研究者的雄心。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② 参见朱本源:《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两大发展趋势(两大模式)和对它们的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科学规划小组史学理论组编:《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321页;杨豫:《法国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

③ 详参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④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中也有学者引入了范式概念。赵轶峰提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已经过两次范式革替,第一次是“进化论-实证主义史学”取代“封建史学”,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取代“进化论-实证主义史学”。他将马克思主义传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的史学称之为“传统史学”,指明其在1980年代已出现危机,进而形成若干非传统的研究倾向,新范式正在酝酿之中。^①

王学典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经历了两次范式变迁:20世纪初叶实证范式对正史范式的取代,20世纪40年代史观范式对实证范式的取代。实证范式和史观范式又进一步完善为“乾嘉范式”和“年鉴范式”。这里所谓“乾嘉范式”的主体并非清代的乾嘉学派,而是民国时期的新考证派,因其继承发扬乾嘉学术传统而命名。在这一范式下工作的学者身具深厚的实证功力,内储取之不尽的旧学资源,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奉行以小见大、小题大做的作业方式,擅用穷源毕流、竭泽而渔的“清儒家法”,推崇“以事实决事实,决不用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②王学典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创立的“年鉴范式”的特征归结为以下五点:第一,在学术理念上,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联系,特别注重释放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第二,在历史理念上,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把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变迁视作社会变动的最后之因;第三,在治史路数的取向上,追求跨学科研究,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在史学领域里的引进;第四,在价值立场上,同情历史上的被统治者和被压迫者,对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暴动、下层造反尤为推崇;第五,在学术嗜好上,特别喜爱研究历史上的大规模社会变动。^③在王学典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述学术特质与法国年鉴学派大体吻合,这就使它在“民国时期的‘新汉学’之外,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方向,铸造了一个‘年鉴派史学’那样的知识范式”。^④在此,范式概念产生了一种升华作用,不仅使两大流派的特征更加系统化、明朗化,两种范式的竞争互动也成为解释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的中心线索。

李振宏在探讨当代中国史学发展时也明确使用了范式概念,认为“所谓史学范式,其实就是历史学的研究形态,是学术群体在一定时期所形成的学术行为模式,是由学者群体所共同认可的学术理念、价值观念、历史观念、思维方式、选题趋向、研究手段、编纂模式、学术规范等方面所组成的不成文的学术成规”。李振宏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范式来看待,认为“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形成的、1949年之后确立起来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比之先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史学,都可以说是实现了史学范式的更替。”^⑤他对这种范式的特征做了概括,更细分为整体史学范式和次级史学范式,并指出整体史学范式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但次级史学范式已经出现变化而且空间较大,是当前努力的主要方向。

① 赵轶峰、高二音:《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趋势评析》,《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

② 参见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页。

③ 王学典、陈峰:《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东岳论丛》2002年第2期。

④ 参见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73页。

⑤ 李振宏:《当代中国史学范式状况的评估与改善》,《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基于以上探索,我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有必要正式启用范式理论。与一般史学史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与革命史具有高度同构性,甚至可以说是革命史的一部分。最早问世的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是第一部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专著,至今仍是该领域的代表性作品。该书将1919—1956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段:1919—1927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初创时期,1927—1937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斗争中的成长时期,1937—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时期,1949—1956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时期。在此基本框架下,作者评述了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进展。书中强调社会政治变动尤其是中共的政策导向、政治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影响,以及与政治斗争相伴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学派的斗争。这属于一种基于革命立场的革命叙事。可以说,此书确立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格局和基调。

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书写方式自有其合理性。政治语境对学术变动的影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事实。中共革命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关系是客观形成的,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能否直接参照革命史研究的模板,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革命史研究的准确度和成熟度。众所周知,目前流行的革命史研究存在很多不易克服的缺陷。以存在诸多缺陷的革命史来建构史学史,难免出现偏差。因此,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书写能否成功,不是史学史研究者自身所能左右的。

其次,长期以来,与一般史学史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也遵循着以史家、史著为中心的基本套路,与传统的学案体大同小异。其中,对“五老”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最为密集。对史家、史著的考察诚然是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但不能以此为满足。尤其是对史家、史著的评述应当具备学术史的眼光,客观考量评定其得失,而不宜一味表彰颂扬,充斥溢美之词。这实际上是被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门户之见所支配。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然难以避免主观爱憎。况且,以史家、史著为中心的研究毕竟是以精英史观为底色的,聚焦于史学界重要角色的言说和著述,即通常所谓名家名作,而忽视影响史学发展的深层制度性因素。

梁启超提出以“时代思潮”为主轴研究学术史,超越传统的学案体,开启了一种新路径,展现了一种新视野。自此,思潮成为学术史或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重头戏。与思潮密切相关的是流派。学术思潮是“一定时期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治学倾向或观念”,学术流派是“某一学科的研究者中,因相同的学术旨趣或师承关系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治学观点、方法、风格的学术群体”。^①思潮衍生流派,而流派是思潮的载体。一种思潮可以产生数种流派,有影响力的流派才能够形成思潮。受此启发,史学史研究者在考察史学家的同时也进一步关注史学思潮和流派。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有助于超越个案研究进行整体把握。但一定时期内诸多思潮和流派并存,它们对史学发展的作用不是等值的,有的足以转移风气、启示来

^① 胡逢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5页。

者,有的则只是昙花一现、旋起旋灭。陈列梳理各种思潮和流派并不能充分揭示学术演化的逻辑,于是有学者主张从学派研究转向学术理路的考察。所谓学术理路,是指治学者遵循的治学逻辑、路径,所认同的治学重心、目标定位、价值标准,所依循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学术派别就是大致遵守相同学术理路的学者的集合体。学术理路是学术派别形成的内在学理依据,学术派别是学术理路的人格化的群体体现。^①相较于学派,学术理路似是更为根本、更为内在的。与学派强调对立不同,学术理路更关注共存互容;与学派强调人的因素不同,学术理路聚焦于学之本身;与学派因时因人而兴废不同,学术理路亘古长存。不过,学术理路与学派的关系毕竟太过密切,究其实仍是一种弱化的学派,尤其是生命力长久、可为后人法式的学派。学术史研究终究无法离事而言理、离人而言学,否则就会流于虚泛。描述那些发挥关键作用、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潮和流派,厘清不同学术理路的并行发展,进而探究学术变迁的内在机制,还需要更高强度、更具概括力的概念。

范式就是这样的概念。范式转换造成革命性的变化,是一种突变而非渐变,与此前的学术研究呈现巨大的断裂。史学方面最著名的年鉴范式就是如此。范式往往代表学术史上的一个时代,代表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主流。并不是所有的思潮或流派都能创立范式。与思潮和流派不同,范式与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不存在特定的对应关系。范式是整体性、系统性更强的概念,涵盖学术研究的各个层面。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范式是适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中国史学史上一场伟大的变革,是中国史学的系统变革,而不是单一要素或某一维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影响持续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共享一套完整的关于历史研究的信念、价值和技术,具有若干标准范例,足以构成一种范式。对研究者而言,引入范式理论有利于克服目前研究存在的瓶颈状态,从新的角度和高度认识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之路

依据库恩的理论,科学研究中旧范式遭遇难以克服的危机才导致新范式的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新范式问世也是基于这样的学术情境。清末民初中国史学出现了旧范式的危机与新范式的崛起。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范式。正史范式基本是一种政治史、军事史和事件史,更是一种精英史,它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相适应的。随着西方民主观念的引进和西学的涌入,正史范式到晚清时期已面临挑战,以至出现“中国无史”论之类的极端批评。^②梁启超等率先发起“史界革命”,以欧日文明史为参照批判旧史、创立新史,引入进化论、民史说和章节体,试图用文明史范式取代正史范式。其成果主要体现为一批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当时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普及影响甚大,可谓开风气之先。但在专深的历史研究中,旧范式的力量依然不减,根基仍未动摇,旧学的权威犹存。所以

^① 何晓明:《学术理路与史学生态》,《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何晓明:《学术理路的梳理是学术史研究的核心》,《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② 刘永祥:《“中国无史”:梁启超“新史学”的传播策略分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说,梁启超等发动的“新史学”运动虽在思想观念层面对传统史学构成了强烈冲击,但新旧范式的转换尚未真正完成。这是正史范式遭受的第一波攻击。

五四前后,胡适等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其特点是参照西方学术理念和门径重新整理和评判中国固有的史料。“整理国故”的成就主要是“新考据学”。他们对文籍史料进行批判性审查,以往被视为权威的经书的真伪都成了问题,经书中构筑的古史体系也动摇了。他们坚持“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原则,大胆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的主张。^①与传统史学尊奉权威和追求致用相异,他们崇尚科学精神和求真理念。可以说胡适等考据学者创建了一种实证范式的历史学。实证范式发起了对正史范式的第二波攻击。与前一次不同,实证范式与正史范式的较量不是进行思想上的论争,而是通过切实的考据工作使得正史范式赖以建立的经验基础被逐步瓦解。但实证范式短于理论综合,只以粗糙简陋的进化论代替儒家史观的历史发展学说,无法构造出一个完整精密的中国历史体系,未能完全填补正史范式被清除后留下的空白。

五四后萌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构成了对正史范式的第三波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阶级史观批判儒家史观,以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和社会阶级的冲突重新解释历史,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体系。相对于正史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范式是同盟军。但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展开了对实证范式的反叛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尽管认可实证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抨击,但认为实证史学已经落伍,与最新最先进的科学不能合拍。与库恩所言的科学发展本身逼出来的必然的范式转换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实证范式尚未充分发展、尚未僵化到山穷水尽时就发起了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公开批评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②唯物史观带来的观念变革又引发历史研究的目的、方法、话语的一系列变化,中国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换终于实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混沌到有序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孕育于五四时期,此时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介绍,在思想文化界树起唯物史观的旗帜。其中李大钊的贡献最为卓著,其《史学思想史》讲义在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中对唯物史观做了专门阐述,称赞唯物史观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其《史学要论》一书以日本学者内田银藏的《历史理论》为蓝本,^③融入唯物史观学说,构造出一种新的史学理论,为中国历史学指示了一个新的方向。李大钊关于上古史、思想史的探讨成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最初尝试。

除《新青年》杂志作为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阵地外,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也发表了一些讨论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的文字,胡汉民、戴季陶等还运用唯物史观考察

① 参见李扬眉:《“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文史哲》2006年第5期。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③ 叶建:《李大钊〈史学要论〉与内田银藏〈历史理论〉的比较——澄清一桩史学公案》,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哲学史和家族制度演变。更值得注意的是,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与胡适在《建设》杂志上展开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辩论,成为初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范式的首次较量。在辩论中,胡汉民等比照西方土地制度的状况,把井田制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来论证;胡适则从疑古立场出发,搁置井田制本身如何的问题,转向井田论的沿革。^①这场辩论进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在幼年,实证范式则正处于上升期,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三年之后才到来,远未到发生危机、难以为继的地步。但在辩论中实证范式已暴露出其“科学方法”的内在缺陷,即只考证古书不研究历史、只消极怀疑无积极建设,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显示出援用欧洲史学及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考察中国社会历史所蕴涵的巨大潜能。

五四以后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主要是理论层面的,尚未与具体的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例如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主要内容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性质上属于哲学,若直接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有些牵强。即使是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也是旨在阐明社会进化的原理,属于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历史延长,史学研究不是其主要任务。上述作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关,但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总之,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唯物史观主要被用来分析新文化运动中所讨论的思想、道德等问题,现实指向鲜明,历史的考察似乎只是一种附属品。多数论者的出发点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学说,而非研究史学。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蔚为思潮,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思潮和范式。对于一种史学范式来说,此时的主要成就是作为核心理论的历史观的初步确立。

1927—1937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初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范式创立阶段最重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话语、研究主题和学术共同体皆由此形成。唯物史观的概念、命题和原理成为社会史论战的基本工具,构成了独特的话语模式。社会发展形态成为中心议题,由此延伸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志性领域。这一范式的学术共同体也在论战期间逐渐聚合,郭沫若成为核心人物,吕振羽、何干之等陆续加入,《读书杂志》上的许多作者此时也基本属于这个共同体,共同体外围也拥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此时的共同体较为松散,内部存在不小分歧。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最早出现的一个著名范例,对后继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导引作用。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的一部分,^②其社会科学化、理论化的特点也已经展露。不过,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还不完善,严整的学术体系也未建立,作为一种学术范式粗具规模但尚不成熟。

1937—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基本定型。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制度化、规范化、组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注重集体协作”,^③制定了研究规划,拥有了《中国文化》《群众》《解放日

① 详见陈峰:《1920年井田制辩论: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文史哲》2003年第3期;蔡瑞燕:《廖仲恺与胡适关于井田制辩论的始末》,《岭南文史》2013年第2期。

② 向燕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与史学发展的新境界》,《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

③ 赵庆云:《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1页。

报》《理论与现实》《中苏文化》等固定的发表成果的平台,运作越来越正规化和标准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了更多范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通史编纂的范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史学理论方面的范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思想史探索的范例。通过一系列范例构筑起比较系统的学科体系,包括中国通史、从史前史到近代史的研究系列、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专门领域等。在方法论建设上,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史料与史学》等作品既提供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下开展工作的准则和技术,又与学院化史学的基本规范(如求真原则、对史料工作的重视)实现了接轨。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在经历了论战时期的淘汰分化之后,不断稳定扩大,向心力增强,共识大于分歧,主要集结为延安和重庆两大群体,成为日后此派史学的主力阵营。随着“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这一阶段中国史研究开始从前期的教条化、西洋化走向具体化、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从移植、模仿走向自主创造,形成了中国史学自身的风格和气派。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至关重要的一环。

20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基本完成,与占有主要学术资源的实证范式呈分庭抗礼之势,并试图为整个中国史学重新定向。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跃居主流,开始成为中国史坛的支配力量。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动,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式基本延续下来,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和遵循,没有质的更动。“文革”前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之争,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内部激进与稳健两种取向之间的拉锯,并未有改变这一范式的诉求。直到改革开放时期,面对国外史学的冲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才为克服危机而进行全面深刻的自我变革。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的主要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实现了对正史范式和实证范式的双重超越,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学术范式,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是:首先,这一范式对历史学做出全新的定义,将历史学作为一门探求规律的科学,历史学旨在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其次,这一范式根本刷新了对历史发展进程和机制的认识,将经济视为历史的重心,将社会结构作为历史运动的主体,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分化说明社会历史的变迁;再次,在方法论上,一是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在理论的导引下从事史实的整理和解释,二是在历史研究中注重辩证分析,力求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等统一起来,把握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要素之间的动态联系;最后,在研究领域和对象上,以社会经济史为主干,聚焦于各个历史阶段社会形态的演变,同时努力发掘下层民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典型形态,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内容和特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在一段时期内阶级斗争观点就具有突出地位,被当作这一范式的根本。这一范式既有相对稳定性,又呈现不断变化的态势。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下从事研究工作的学术共同体,经历了一个聚集、分化和重组的过程。这一学术共同体是动态开放的,不断地有人加入、有人退出,因而其构成也较为复

杂。不但后世公认的以郭沫若为首的“五老”及其周围的史家群体属于这一共同体,《建设》《读书杂志》《食货》半月刊上的诸多作者也一度身处这一共同体之中,对范式构建做出过一定努力。他们既包括国民党人胡汉民、陶希圣,也包括托派的李季、王宜昌等,还包括大量的无党派背景的自由学者王礼锡、胡秋原等。这些共同体成员的政治认同与学术取向是不对应的。换句话说,政治背景、党派归属并没有妨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信从和运用。以往将中共及其外围的学者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做法过于简单化了,不免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当作一种党派史学。此外,以“五老”为核心的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小的差异与分歧,最典型的是他们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上就产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①这些争论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居于“五老”首席的郭沫若并非一直处于众星捧月的地位,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都曾对郭沫若多有批评,将其视为一位有缺陷的先驱者。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不是清一色的,也不总是异口同声、步调一致的。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过程中,域外学术产生了关键性作用。外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媒介。五四以前及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多经由日本的作品接触和认识唯物史观。在社会史论战时期,苏联、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研究为本土学者提供了样板,催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涌现的众多概念、范畴和体系,几乎都能从海外寻找到源头;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面貌,甚至缺陷都与海外的中国研究相类似。此时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接受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局面,不仅马、恩、列、斯的作品被奉为指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考茨基等的相关论述也成为重要依据,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分支竞相登场,争奇斗艳,推动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成长。^②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忽视外来理论与中国历史材料和史实的结合。到“学术中国化”运动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逐渐走出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笼罩,寻求本土化之路。但苏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学界仍然发挥着持续性影响。

范式理论来源于科学史,移用于人文学科特别是史学史时不可生搬硬套,有必要根据历史学的特性加以调整和补充。首先,库恩的范式理论强调科学内部的变化,将科学研究出现的危机及其克服当作科学发展的动力,较少考虑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力量;但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来说,社会政治因素是不可缺省的。从宏观而言,这一范式的构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具有密切关联。一定的文化政策、权威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导向作用,既提供了驱动力,也构成了规训和约束。从微观来看,学术共同体中研究者的政治归属、思想定位和学术训练,直接影响着、塑造着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状态。一方面,政治力量利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推动其政治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借助政治力量扩张其学术地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不仅是学术自身发展的产物,也是一个学术与社会、学术与学者互动共生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政治因素与学术发展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主从关系。对于政治化的学术,研究者不能不有一种反思的态度。

^① 参见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893—1895页。

其次,范式理论原创者认为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互斥性对于史学不尽适用,不同史学范式可以并行互补、轮回交替。^①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是在批判正史范式、实证范式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但并非与它们截然对立,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尽管颠覆了作为一个体系的正史范式,但中国传统史学中某些部分、元素仍可以被回收利用,经过批判改造转化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有效资源。比如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现实性的特点是相通的,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汇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以社会形态理论为基本框架,但有学者认为编年纪传等传统史书体裁仍可发挥其长处。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实现中国化也离不开对传统史学遗产的继承。

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与实证范式的关联则更为密切。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一方面对实证范式发动攻击,挑战其权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出现偏向时也肯证实证范式的价值,融会吸收其优点。两种范式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的两大路向,存在互动对话的可能。抗战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已经能够正视和借取实证范式的合理之处,“呈现出显著的合流趋势”。^②另外,两种范式相竞争的结局也并非后浪推前浪、新桃换旧符,而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占据主流,终于一统天下,实证范式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1990年代以后实证范式东山再起,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出现危机。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创新则成为当前面临的问题。所以,中国史学的范式转换,不是新范式必然要征服、取代、清除旧范式,新旧范式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融合也是可能的,甚至旧范式卷土重来对新范式构成挑战。历史学的范式转换即使是革命性的,也并非斩钉截铁、彻底决绝的,而是新与旧相纠结,断裂与延续、离异与回归相统一的。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势在必行,必须走出以往的套路和模式的羁绊,形成新理念、新话语、新形态。启用范式理论,从范式构建的角度观察唯物史观的引入给中国史学造成的革命性变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将呈现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视野和格局。当然,范式理论本身有其局限性,今人运用时必须顾及后来学者所做的修正和发展,同时结合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加以损益变通。若能如此,将有助于深入探索学术演变的内在机理,全方位展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共性与个性、常规与反常、渐变与突变之间的交织互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化、理论化,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能提供一定启示。

(责任编辑:张燕清)

^① 美国学者麦金太尔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已指出新旧范式之间存在共融性和承继性。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 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474页。

^② 详参王学典:《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40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动向之一》,《文史哲》1991年第3期;张越:《试析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的重视》,《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